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丛书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

文献资料选编

主 审
主 编

陆大钺
唐润明

重庆市档案馆 编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丛书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主 审 陆大钺

主 编 唐润明

重庆市档案馆 编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
重庆市档案馆 编

责任编辑 唐润明
封面设计 陈科英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25

字 数 7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工本费 50.00 元

准印号:渝内字(2005)005

前 言

世纪之交的 1999 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之际,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深远谋略,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适时地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增强西部地区综合实力,缩小我国地区差距,全面推进我国向着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前进的重要举措;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边防,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不仅是西部广大地区 and 人民梦寐以求的大事,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之后,不只是党和政府将实施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全力推进;有关西部开发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也成了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专家学者或著述或撰文,提出了众多的理论观点供各级政府参考。在这些著述中,或多或少地对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大后方的开发有所涉及,但这些研究和著述,又都是零星分散的,不全面系统的,更缺乏一部完整系统的史料汇编供各级领导和学者

参考借鉴。而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开发,虽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迫不得已的行为,但它却是 20 世纪及其此前的整个历史上,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成效最著的一次开发,是我们总结历史上西部开发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本着“经济建设发展到哪里,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服务理念,我们从众多的历史文献中择要编辑出版了此《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一书,其目的就是要紧跟“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为今天各级领导的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和参考,也为学术界进一步全面研究、深入总结有关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提供一部翔实的历史资料,从而发挥“档案”这一潜在的信息资源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达到我们所冀求的档案“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的目的。

本书由唐润明负责全书的策划、选材、编辑整理及大部分的校对工作,陆大钺馆长负责全书的审校,徐建明、罗永华参加了部分校对工作,曹国英、李军在资料提供方面给予了相当便利,李寿臣在编务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编辑说明

一、原文内明显的错别字作了更正；

二、标点符号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个别与现行不符者作了更改；

三、原文中的数字(几乎全为汉字)，均按规定作了技术处理；

四、原文年份按规定作了处理；

五、文内个别字迹实在看不清者，用□代替；纠正错字，用〔〕表示；增补漏字，用[]表示；编者说明的事项，用〈〉表示；

六、原文多为竖排，文内的“如左”、“如右”、“左列”、“右列”改为横排后，均变成“如下”、“如上”、“下列”、“上列”，并将“上”、“下”二字加<>标识；

七、为便于研究者更好地窥其全貌，保持各文章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们均系原文照录；个别系节录的文章，均在文内作了说明；

八、本书所选文献资料，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为限；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有关文献和开发建设情况，因有关方面已出有专书，此次不包括在本书之内，这是应特别说明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序论

唐润明

我国西部地区幅圆辽阔，蕴藏丰富。古代的西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而且长时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南地区则气候湿润、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四川更享有“天府之国”之美誉。但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中心，加之适宜的气候，便利的交通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开始被视为“边陲地带”，长时期处于一种交通阻塞、信息封闭、思想落后、民穷财尽、困苦不堪的状态，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在此期间，虽然也不时泛起一些开发西部特别是西北之时论，但均音微势弱，影响不大。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动荡的历史才给地处边陲、向来落后的中国西部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促使广大的西部地区发生着巨大变化。

导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西部地区发生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及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在中国东部沿海广大富庶地区或沦为敌手或处于战区的同时，为配合其政治、军事的需要，先是将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

关、厂矿、学校、科研团体等最大努力地内迁西部各地；继而又在工业、农业、交通、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制颁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与法规法令，全力奖助上述各业的发展，在有力支撑长达八年、艰苦异常的抗日战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为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前后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梗概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被迫进行的，所以无论是当时民间社团的一切主张、言论与建议，或是政府当局制定颁布的所有政策、法规和法令，无一不是以“军事第一，服务战争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因而也就无一不留下战争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与历史事实，要求我们在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时，必须首先将其纳入“战争”这一特定的范围内来考察。

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使得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中国的一切建设事业诸如政治统治中心的形成，经济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设置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于东北、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广大的西部地区^①则因交通的限制以及各个地方军阀的混战不休，长时期处于一种地瘠民困的混浊状态，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越拉越大，形成巨大的天壤之别。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有合乎《工厂法》的工厂3 935家，资本377 857 742元，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的上晓（工厂1 235家，资本148 464 463元）、浙江（工厂783家，资本26

^① 本文所谓的西部地区，主要是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省，与现在“西部大开发”中所指的西部略有差异。

183 976 元)、江苏(工厂 318 家,资本 39 562 718 元)、青岛(工厂 148 家,资本 6 051 090 元),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53.62%(全国 38 个省市区共 11 562 588 方公里,西部 10 省共 6 200 216 方公里)、总人口 24.57%(全国为 471 245 763 人,西部 10 省为 115 809 844 人)的西部 10 省,仅有工厂 344 家,约占全国总数的 8.74%^①;在 1936 年全国(东北除外)成立的 193 家新式工厂中,西部 10 省区只有 5 家,仅占总数的 2.59%^② 在全国所有的 1 397 653 千市亩耕地苗积中,西部 10 省只有 328 692 千市亩,约占全国总数的 23.51%;在 1937 年底全国所有的 110 952 公里公路中,西部地区只有 28 370 公里,约占总数的 25.56%;在全国 164 家银行总行、1 927 家分行中,西部地区只有总行 23 家、分行 227 家,分别占总数的 14.02%、13.95%;在全国 108 所高等院校中,原设于西部各省的仅 9 所,约占总数的 8.33%;在全国 1 304 所医院中,西部各省仅有医院 172 所,约占总数的 13.19%;而作为国家和地方各项事业发展基础与源泉的财政税收收入,西部各省不仅收入甚微(1936 年度仅 72 756 657 元,只占全国总数 385 328 575 元的 18.88%),且相当省份在很长时期内均无正规的财政预决算制度,而是处于一种随收随支的混浊状态^③。

此种经济文化分布的差异性,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而且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军备以保卫领海领空的中国国防带来诸多不利。这种不利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四省,其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对

① 土地面积数、人口数分别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制《中华民国统计简编》第 19、20 页,中央训练团 1941 年 2 月印行;工厂数见简贯三著:《中国工业建设的分区问外》,载《财政评论》第 14 卷第 1 期。

② 实业部统计处编印:《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实业概况》,第 50~51 页,1937 年 3 月初版。

③ 以上统计数字均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制:《中华民国统计简编》相关章节,中央训练团 1941 年 2 月印行。

此,当时的一切有识之士,都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即向中国内陆发展。

早在1919年,护国军著名将领蔡锷在其辑录出版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的结论中,就曾指出:“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据险以守,节节而防,以全我军而老老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①与蔡锷同学的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也在1922年撰文指出:面对临近我国日富侵略性国家之唯一制胜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②嗣后,我国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如傅斯年、胡适、丁文江等人,在全面分析比较了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情形后,继续坚持并发扬光大着这种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滞敌胜敌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转向内地,持久作战的思想。他们纷纷撰文指出:“中国在抗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胡适则更明确地提出了要以最大的限度,以牺牲华北、华东等沿海、沿江口岸的决心,坚持“三年至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和援助。”胡适还认为“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面对日益险恶的中日形势,执政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样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当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即于事变后的第三天也即1月30日,向中外各国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

^① 转引自台湾吴相湘著:《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载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第5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78年11月出版。

^② 转引自台湾吴相湘著:《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载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第5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78年11月出版。

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中日两国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就将“我们今后是否仍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第一次正式提上国民党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①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所提的《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并作出了“(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的重要决定^②。此举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府就确定了一旦战争爆发,即向中国内地迁移和发展的战略方针。

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直到1935年10月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都是将其开发建设中国西部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1932年5月,“西京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33年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的设立,都表明国民党中央已将西北的各项建设纳入其施政日程。此后,不仅是国民党中央将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作为施政的重点之一进行;而且以张人杰、邵力子、邵元冲、张继、戴季陶为首的一大批在国民党中央有实力和影响的人士,对西北的建设和宣导更是不遗余力。“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也是此伏彼起,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响亮的口号和最具影响的声音。一时间,有关开发西北的提案诸如《开发西北案》、《促进西北教育案》、《西北国防经济之

^① 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所致开幕词,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4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89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二)第4页,1981年12月出版。

建设案》、《拟请组织健全机关集中人力财力积极开发西北以裕民生而固国本案》、《请设国立西北大学以宏造就而免偏枯案》等,相继在国民党的历次中中全会或中常会上提出和通过;新亚细亚学会、开发西北协会、西北问题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时人有关开发西北之建议、调查、计划和报告等言论,更是充斥于全国各个报刊杂志之中;前往西北各地进行考察、调查和研究的个人和团体,也是不绝于途。在全国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不仅陪都西京的筹备工作逐步推进,而且西北地区的其他各项事业也得到自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各项建设在原有基础上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到1937年初,公路方面完成了自西安至兰州全长约750公里的西兰公路和由西安至汉中全长约390余公里的西汉公路;铁路方面延长了陇海铁路;民用航空方面开辟了从兰州经宁夏至包头的航线;水利方面更于全国经济委员会下设立“泾洛工程局”,专门办理陕西泾惠、洛惠两水利工程,前者于1935年4月完工,可灌溉农田50万亩,后者于1937年夏完工,也可灌田50万亩以上,嗣后又相继兴办梅惠、洮惠、云亭等水利工程;农业推广方面,分别于青海、甘肃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及分场,并购置外国优良牲畜以推进西北畜牧事业的改进,并于陕西成立“陕西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以主持规划陕西的合作事业;鉴于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又于行政院下设立专门的“新疆设计委员会”,先后聘定委员80人,专负新疆的建设设计事宜^①。

虽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最先将选择陪都、迁建首都的着眼点放到了中国的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开始经营西北和营建西京。但是,国民政府的此种决策,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实现全国真

^① 《全国经济委员会对五届三中全会工作报告》(1937年2月),载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0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西北建设》(三)第500、502—503页,1981年12月出版。

正统一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将土地虽广、资源虽丰但地贫民困、人烟稀少、经济普遍落后、粮食尤为缺乏的中国西北地区作为中国对外战争的根据地来建设和经营,不仅在对外战争中仍将处于一种不利地位,而且建设起来也是十分困难、收效甚微的。用作为国民党中央负主要军事与国防责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旦中国发生对外战争(即中日战争),即使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但“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①因此,要下定与日本最后作战的决心,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力众庶的地区,来作为战时政府首脑机关及整个国家的根据地。为此,蒋介石从1934年秋开始,率其主要幕僚,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18个省区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蒋介石通过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在逐渐控制了西南各省后,于1935年10月作出了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定在西南四川的重大决策^②。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全国各界的注意力也骤然由江西转向四川,所谓“以前关心江西匪祸猖獗的人们,现在视线都转移到四川来了”是也^③。全国性的一些著名报刊如《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华北先驱报》等,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篇幅关注着四川及西南的一切并对之作了大量的报道,中国科学社、中国各地新闻界、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及江浙等地金融界的代表也纷纷组团,于此前后深入西南各地考

^① 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1974年出版。

^② 唐润明：《试论蒋介石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

^③ 黄渠：《川军剿匪之经过》，载新中国建设学会编：《复兴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四川专号），1935年3月1日出版。

察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形。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撰文，指出四川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整个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关系。“四川是中国的堪察加，西南是中国的安哥拉”，就成了“九·一八”后数年间国内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鉴于四川及西南在整个国家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国民党中央才迅速地乘 1935 年“追剿”中国工农红军之机，完成了对四川乃至整个西南的控制，并开始着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在对西南各地采取整理军队、改革政治、开发交通、统一货币、转移风气等措施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开始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建设转向西南。在“追剿”红军途中，蒋介石不仅在贵州倡导发起了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而且还于 1935 年 6 月 25 日致电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指示其将东南沿海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员来川黔筹备整理。”同年 8 月 1 日，蒋介石又致电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要求其将“四川重工业之建设程序与其负责筹备人员从速由资源会指定派来”^①。在当时日益紧张、险恶的中日关系下，蒋介石指示将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兵工企业和重工业秘密内迁西南地区之举动，不仅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积极备战的表现，而且也是建设四川抗日根据地的先声，是国民党政府有意识、有目的、有准备开发西南的起点，是国民党中央开始将其建设中国内地的注意力由西北转向西南的标志。

在国民党中央开始认识西南地区于对外战争中所处重要地位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开发的同时，当时的其他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开发四川及西南比开发西北更为重要。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对日战争，“势将由东北打到西南，以地理观点而言，西南一定后

^① 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 2 册，第 599 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31 日初版。

亡，如果这个时期大家能够努力建设，可望做到西南不亡。”并认为只有“使后亡的西南，成为不亡的西南，必须这样，中国才有前途。”^①更有论者直接著文，对比分析西南西北之优劣及国民党中央政府将注意力由西北转向西南的原因：第一，抗战发动之后，华北各省即相继沦陷，西北以邻近战区，国人均以为不是安全区域，为策永久之计，不如先建设西南；第二，认为西北的气候与物质环境，比西南差，就建设的难易论，建设西北不如建设西南；第三，就对外交通路线论，西南也比较西北便捷^②。著名学者、科学家任鸿隽所认定的“四川天府之区，应该利用来做抵御外患，复兴中国的根据地，所以整理四川，应该比开发西北尤为重要急切”的观点^③，则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从此以后特别是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没有迁到早已确定的作为行都的洛阳和作为陪都的西安，而是远迁到长江上游、位居西南的重庆之后，先前曾一度高唱入云的“开发西北”的呼声，便突然地沉寂了下来。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所以国民党中央不仅于战前在西南的重庆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全面经营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而且在抗战爆发后，迅速地宣布迁都重庆，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

受抗战爆发及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影响，战前密集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管理手段、各种人才以及众多的机关、工厂、学校、银行和文化教育机关、科学技术团体等纷纷西迁广大的西部地区。但由于此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及其它中枢指挥机关迁到了西南的重庆，加之人事、人力、交通、物产以及自然条件诸方面的便利和优越，所以不仅内迁到西南的工厂、

① 台湾刘航琛：《戎幕半生》（18），载台湾《新闻天地》，1967年11月4日出版。

② 转引自赵宏宇：《如何巩固西北》，载《西北论衡》第9卷第6期。

③ 黄桷：《川军剿匪之经过》，载新中国建设学会编：《复兴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四川专号》，1935年3月1日出版。

学校、机关数要远远多于西北,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对整个中国西部的开发中,也采取了“以西南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方针。1938年,经济部在其拟定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就明确指出战时工业建设的区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以西康、青海、甘肃、广西、陕西为补。”在1939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中,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开幕词中指示:“现在政府已斟酌西南各省的资源及交通,决定在四川境内,选择适当地点,为第一期要发展的工业区域,从事于煤矿、煤油及煤气的开采,并已设立酒精厂、发电厂、化学工厂等,尚正在计划中的有造纸厂及制糖厂等。”^①这样,在抗战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南地区便成了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发建设的重点,在1938年底至1940年间更掀起了一股建设西南、开发西南的热潮。在此期间,除了国民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制定颁发了大量的开发西南的方针政策、法规法令和计划措施如资源委员会拟定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建设计划大纲》(1939—1941年)、西南经济研究所草拟的《西南经济建设纲要》、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拟定的《川康建设方案》外;民间各社会组织还相继成立了以集合工商农矿金融各业协助开发川、康、滇、黔、桂、湘等省资源,增进后方生产,巩固抗战力量为宗旨的“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以调查研究西南各省之经济实况并拟具建设方案为宗旨的“西南经济研究所”及以促进川康经济建设并使其合理发展为宗旨的“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等学术研究团体。除此之外,一些政府高官要员如孔祥熙、陈立夫、翁文灏、邓汉祥,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经济理论家如卫挺生、罗敦伟、寿勉成、张肖梅、胡秋原、陈豹隐等,也是纷纷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开发、建设西南经济对于整个抗战建国和国家民族的重要,认为“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在国民党中央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① 孔祥熙:《全国生产会议开幕词》,载全国生产会议秘书处编印:《全国生产会议总报告》,1939年8月出版。

下,西南地区的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及其他各业的建设突飞猛进,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

抗战时期大后方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在1938—1940年处于上升发展阶段,1941年达到顶峰。从1942年起,因受国民党有关政策和战事的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显得后劲不足而处于徘徊和停止不前的状态。在此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后继无力,而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仍僵持不下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才又重拾战前“西北开发”的旧旗,以“开发西北”来拓展大后方经济开发的内涵,不仅将政府而且也将民间的注意力引向了西北。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将其开发大后方经济的注意力由西南向西北拓展的标志,是1942年8月17日蒋介石在巡视甘肃时于西北干部训练团出席甘肃各界扩大纪念周上所作的《开发西北的方针》的讲话和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的《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在《开发西北的方针》一文中,蒋介石盛赞了抗战六年来西北各方面的进步及其广大肥美的土地、开采不尽的宝藏,明确地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中国”的口号,并表示要用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有计划、有决心地将西北建设成为中国“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①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又提出了“建国基础在西北”的号召。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的《积极建设西北以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主要系根据蒋介石“建国的基础在西北”的指示而提出,它不仅提出了建设西北的基本原则——“建设西北,应按照西北各种客观条件,采取合理步骤,特别注意安定地方,修明政治,……同时并应培养其人民自治能力,扶植其文化宗教,加强其基层机构及文化团体之组织与指导,以树立民权主义之根基。”而且提出了建设的目的——“西北资源尚待开发,人民经济基础,至为落后。今后开发建设西北之一切

^① 蒋介石：《开发西北的方针》，载陶百川主编：《中央周刊》第5卷第27期。